

上接C01版

梁文道： 跟自己喜爱的东西保持距离

□ 晚报记者 张改华 实习生 陈晓雪 宋少杰



博客 VS 新作

“今年9月还有一本新书出版，名字叫《读者》”

记者：网易、新浪都有您的博客，网易博客的更新速度很快，基本上保持在一天一篇的频率。这都是您亲力亲为的吗？

梁：没有，我真正自己的博客只有一五一十和牛博。网易和腾讯的博客是我授权的，他们大概是看到我前面两个博客有新东西了，就转载上去。至于新浪的那个梁文道博客根本不是我的，但文章是我的，所以我也不大清楚是谁贴的，莫名其妙地把我几年前的东西杂乱无章地拿出来登。

记者：《噪音太多》今年3月份出版，收录的都是您发表在报纸上的一些关于电影和音乐的感悟。里面的文章，有没有因为要急着交稿勉强而为之的情形？

梁：大致上没有。不过有一点问题，就是文章写完之后，我一般都不再看了，包括报纸出版之后也不看。因为我的文章都是手写的，传真过去之后，报社的人打字时可能会有一些错误。另外文章中经常有一些英文，报纸在拼写上也会有一些错误，再加上我写繁体字，所以这方面出的纰漏会比较多。

记者：出版的书中也有这种问题吗？

梁：是的，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，我要求出版社把样书寄给我看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没有收到。等我收到看到那些错误要求去改的时候，出版社告诉我已经来不及了，要赶着出版了。所以，在第二版出版时我才把那些错误改正过来。

记者：《噪音太多》3月出版，《我执》是4月，那么，最近还有没有出书的计划？

梁：今年9月，法律出版社会出版一本我的书《读者》，是一本书评和书话。

读书 VS 人生

“假如没有书，也许我会有另一个不一样的人生”

记者：您日常的时间是怎么安排的？固定吗？

梁：常常很忙，不固定。做节目也都是找时间做。但读书的时间是固定的，差不多每天四五个小时，这是我生活中的最重要的时间，我宁愿牺牲别的时间来保证它。

记者：我们做一个假设：如果把书从您的生活中夺走，您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？

梁：也许我就不能做现在的工作，因为我的工作和我书联系在一起，我的生活也和书联系在一起，但是也许我会有另一个不一样的人生。

记者：您做《开卷8分钟》这个节目，阅读量相当大，“几乎是每天一本的速度，有时候一天两本甚至三本。”这种速度对阅读有影响吗？您说过，做这个节目您的牺牲太大了，是不是有些做节目需要的书，并非您想看的？推荐书籍有自己的标准吗？

梁：当然是我想看的书，但不一定是最喜欢的书。我最喜欢的书很难在节目中一一介绍。推荐的书都是我自己定的，也都是凭感觉去挑选，其中肯定有一些无法明言的标准。

记者：推荐的书都是您读过的吗？

梁：当然。

记者：《我执》和《噪音太多》的接连出版，让喜欢您的人欣喜不已。您说过，“我从不考虑自己可以做什么职业，因为对我来说，只要符合两个条件，什么职业都可以做，一是必须是自己喜欢的；二是可以令我完成理想的。”您做过的职业很多：主持人、大学教授、专栏作家、电视台总监，以前还做过实验剧场的编、导、演、行为艺术创作及视艺展览策划，而这些都是与文化相关的。您的职业理想是什么？是与文化传播有关的一切职业？

梁：我没想过这个问题（笑）。我知道很多人会先设定一个理想，然后说我要怎么怎么做，再往那个方向迈进。我的思考方式不是这样的。我是遇到一些事情后，先看自己喜欢不喜欢，然后会有一个倾向。比如说我做电台台长，在行政管理方面和其他人沟通的时候，我会先有一个倾向，让他尽量往我的倾向发展。所以，我不是那种先设定理想目标，然后就一往直前地向它走的作风。

记者：大家对您的定义是公共知识分子，而您自身也是一个资深媒体人，这两个身份应该说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公众。您认为现在的工作主要是为了什么？是自己的爱好吗？还仅仅是工作？



记者：英国诗人萨松写过一句警句，余光中将其译为“我心里有猛虎，在细嗅蔷薇”，意为人的两面：阳刚与阴柔。有人讲《常识》是猛虎，《我执》是蔷薇。这样的划分您是否同意？

梁：这种划分我有点保留，当然，这两部作品很容易给人这种感觉，就好像《常识》理性、尖锐，而《我执》温柔、感性。其实，仔细看的话，就会发现我的基本态度是一致的。很多人认为《常识》尖锐，我觉得我的表达方式

理想 VS 困难

“我希望营造一个理性、宽容的思想环境”

梁：公共知识分子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古人所讲的读书人。我以前讲过，知识分子是没有私家的，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应该是公共知识分子，哪怕他只是作学术研究的，但当他想到自己的知识和自身位置的公众性时，他也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。

我现在的工作绝大部分是为了爱好，希望能营造一种理性讨论问题的气氛，一个宽容、友好、善意的思想环境。

记者：那营造的过程中，会遇到困难吗？

梁：当然会。这是一个比较急躁的时代，好像每个人都来不及看清楚自己要讨论的东西，就急着下笔去写；还没来得及听清楚别人说话，就赶快要作出反应。这种情况下的表达，可能就是某种偏见的产物，可能是一种情感驱使的结果。所以，这样表达出的观点往往会比较偏狭、不够淡定，自然就不够宽容、不够理性。

记者：《噪音太多》里面曾写道：“有这么一个定则很难被打破：你喜欢一部小说，就千万别去看改编自它的电影；因为有九成九的机会，你将失望而归。但是又有一种常见的现象：你喜欢一部小说，明明知道一条定律的存在，但你还是忍不住去看它的改编电影；因为你实在太想知道那

些向来只存在于脑海之中的面孔与风景一旦具体化成视觉上的形象，会是个什么样。”这个句子让很多人有共鸣。其实你的文字在表达某种情感时，用一个词语来形容就是“准确”。这是天分还是后天的修炼？

梁：两者都有吧！但这种天分是可以后天培养的。我的文章其实并不长，我曾经训练过自己写很长的东西，但后来我要求自己由杂返简，压缩文章，从5000字到3000字，再到1000字。很多东西，并不是字数多才会有深度。现在许多人写东西时，比较放纵自己的文字，结果想要表达的意思更加模糊，失去了准确性。这也许跟逻辑有关系，所以我常常说，去学点逻辑学是有好处的。

记者：看得出来，你喜欢的音乐，通俗一点讲，是比较小众的。关于内地的小众艺术，你有过关注吗？有没有比较喜欢的小众艺术家？

梁：坦白说，我不是太熟。因为在香港不大能买到内地小众艺术家的唱片，当然我知道还是可以通过上网听，可是我本人不大喜欢在网上下载音乐，所以就没什么机会听到。但是我在内地有很多朋友，比如写乐评的张晓舟，有时候我会通过他们找到一些小众音乐来听。

《我执》 VS 《常识》

“《我执》很多故事都是虚构的，我那时很忙，没时间哀伤”

是温和、有节制的。《我执》也不是滥情，其中的感性其实也是很理性的。我不是很有激情，或者容易感伤的人。可能是由于这两部作品一个写知识，一个写感情，比较容易有这样一个对比。

《我执》也不是那么私密。文中好像我用了很私密的语气和故事的写法，但探讨的还是理性的课题，就好比分析什么叫“情歌”，分析什么叫“我们重新来过”等等。

记者：您说，“人生种种烦恼，无不源于《我执》。”那这本书的用心当在“去除我执”。可以这样理解吗？

梁：也可以！我们都难免困在一些执著里面，而感情是最极端的一个执著的状态。所以我去写爱情，就是在写一个处在最执著状态的人时，他应该是什么样的。在这种状态下，能够摆脱当然更好。

记者：去除我执，您做到了吗？

梁：当然没有（笑）。

记者：《我执》中收录的都是昔日的随笔，您说这是“看似日记的虚构散文习作”，果真是虚构的吗？

梁：很多故事都是虚构的，比如说文中的“我”“他”是虚构的。有些是听来的故事，一部分是以前的经历，也有一部分是创作的故事，还有一些自己的思考，当然文中关于感情的思考肯定是真实的。

记者：有人说在《我执》中有一个影响您很深的人，这个“他”或者“她”存在吗？

梁：其实是没有这么一个人的。仔细看

就会发现，整个故事场景在不断变换，“他”也不会是一个人。只是为了构造出“我”的处境，必须要投射一个“他”。

记者：您写随笔与自己的境遇有所联系吗？写这些随笔也是释放压力的一种方式吧。

梁：（笑）不是。这是一个朋友要我写的，我答应了写专栏，必须得写。他还要求必须写感性的东西，我就这么写喽！现在他不做了，我就没写喽！如果他继续做下去，我想我还会继续写的。

记者：我读《我执》，最大的感受就是这本书中流露出的忧伤，或者说悲观。不知道我这样的感受是否契合您文章所要传达的意境。您是一个悲观的人吗？

梁：我不算是很悲观的人，我只是有些冷漠，别人很热烈地欣赏喜爱的东西，而我就很容易会不自觉地染上冷漠的态度，跟自己喜爱的东西保持距离。写感情的时候，很容易用冷漠的态度写出感情阴郁的一面。

记者：《我执》中很多关于爱情的随笔，比如《解谜》《真名》等，是否和您当时的生活状态有关系？您当时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呢？

梁：《我执》中的感觉和想法是真实的，但那段特别忙，那是我发疯的时间，我每天平均要交至少一篇以上的评论。那应该是2006年，当时《我执》中的很多内容和《常识》《噪音太多》都是同时交叉进行的，此外还要给报纸写时评、书评，还要做节目、教书什么的，忙得不可开交。根本没有时间让自己心情不好，相反我是心情如一，基本稳定。